

doi:10.13582/j.cnki.1672-7835.2023.01.020

# “数字化遗忘”:数据记忆的 互联网语言危机

张顺军

(湖南科技大学 人文学院,湖南 湘潭 411201)

**摘要:**从记忆的角度来看,语言面临信息处理和信息交流两方面的压力:在信息处理要求下,作为存储的语言奉行“术”优先的原则;在信息交流要求下,作为回忆的语言呈现为“力”的选择性。从语言的角度来看,互联网语言就是一种数字文字,并因技术的极致发展而呈现出独特的记忆结构:化静为动的连接之“术”和化无为有的计算之“力”。然而,互联网语言并没有因此减少记忆危机的发生,反而表现为两种极端情形的“数字化遗忘”即“不去记”和“忘不了”。这提醒我们,应对互联网时代记忆危机问题最重要的策略是保持记忆与遗忘的张力关系。

**关键词:**数据记忆;数字化遗忘;记忆危机;互联网语言

**中图分类号:**G206.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7835(2023)01-0148-08

西方先哲柏拉图有预见性地认为,相对口语对人类记忆能力的锻炼而言,文字的产生是人类记忆的灾难。这是最早关于媒介与记忆危机之间关系的思考与发问。受到柏拉图的启发,一方面,阿莱达·阿斯曼富有创见性地将文化记忆危机问题转换为记忆“术”“力”平衡性问题。在她看来,记忆有两条道路,一条是以“术”为名的道路,即存储,它被理解为任何一种以存储和取回的一致性为目的的机械方法;另一条是以“力”为名的道路,即回忆,它一定表现为存储和取回两者间的差异,却为身份认同提供支撑<sup>①</sup>。另一方面,她沿袭柏拉图记忆“术”“力”天然对立的内在立场,并将之应用到数据记忆<sup>②</sup>分析之中。她明确指出,数据作为一种数字文字、数码文字或电子文字呈现新的记忆危机:它一方面大大提升了记忆之“术”,另一方面又越来越远离记忆之“力”,即与回忆及人的身体的关联度。据此,她发出了“数

字化遗忘”之问:数码文字还是一种记忆的媒介吗?或者更是一种遗忘的媒介?<sup>③</sup>

可惜的是,阿莱达·阿斯曼虽提出了这一问题,却对“数字化遗忘”的发生明显缺乏细致而深入的推演。她看到了语言形态变迁影响下数据记忆的转折性,即二千五百年来文字作为记忆的主要隐喻正为电子网络这一宏大的隐喻所取代<sup>④</sup>,却忽略了语言本身就是一切媒介的元媒介。这使得她只是局限于文字与数字文字的比较,没能历史地考察语言及其背后媒介技术的变迁与记忆之间的关系来论证和推演。同时,这也直接导致她很自然地将“数字化遗忘”归因于互联网时代人类记忆的“力”和“术”之间的此消彼长。本文的探讨基于阿莱达·阿斯曼的疏漏而展开。

## 一 作为记忆的语言

当代媒介环境学派领军人物罗伯特·K·洛

收稿日期:2022-05-11

基金项目:湖南省汉语方言与文化科技融合研究基地资助项目

作者简介:张顺军(1975—),男,湖北荆州人,博士,讲师,主要从事文化与传播研究。

①阿莱达·阿斯曼:《回忆空间:文化记忆的形式和变迁》,潘璐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9—25页。

②从笔者所搜集的文献来看,数据记忆和数字记忆两种概念并存。不过,二者内涵几乎同义。本文取前者,主要原因是认为当下记忆固然都是被数字化表达,但其形态,更准确的表达应是数据。

③阿莱达·阿斯曼:《回忆空间:文化记忆的形式和变迁》,潘璐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478页。

④阿莱达·阿斯曼:《回忆空间:文化记忆的形式和变迁》,潘璐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2页。

根(以下简称洛根)从媒介角度对语言起源及演化的推演对于我们认识语言与记忆之间的关系颇富启发意义。在他看来,语言既是交流工具,又是信息工具,可以用一个公式来表示:语言=交流+信息。语言又是心灵延伸的结果,可以用“心灵=大脑+语言”的公式来表示。

### (一)信息处理要求下的“术”优先:作为存储的语言

口语时代的记忆通常被归属为修辞学的一种技巧,并被区分为两种类型:自然记忆和艺造记忆。自然记忆与思想同时诞生,是与生俱来的,也是神秘不可测的。艺造记忆可以通过专门训练来获得,它通常由场景和形象构成。“场景是便于存放记忆的各种位置……形象是我们希望记忆的东西的形状、标记或影像。”<sup>①</sup>在此,“记忆的艺术就像一种内在书写。那些识字的人可以写下别人向他们口述的东西,也可以读出他们写下的东西。同样,人们就可以将听到的东西放在记忆场景,然后根据记忆进行描述”<sup>②</sup>。彭冈巴诺更是直接指出,自然记忆只源于自然天赋,无任何巧妙方法的帮助;艺造记忆是自然记忆的辅助……称作“艺造”,来自“技艺”一词,因为是通过头脑的技巧获得的<sup>③</sup>。显然,艺造记忆本质上虽然就是自然记忆的媒介化和外部化,但其记忆过程与人的大脑认知密切相关,不可分割。因此,作为记忆的语言最初既体现为技术,又体现为能力。

在洛根看来,语言的发生是人类最早的类人猿祖先对生存复杂性混乱的回应。人类生存与活动不断复杂化,使得人类单纯依靠感知的感官系统已不能应对。于是,为了应对信息超载问题,口语与概念化思维作为一个新的抽象层级而发生。语言的出现使得抽象思维成为可能,而抽象思维又促进新语词的出现,并赋予其语法功能与句法结构,从而使得语词与概念相互表征,人脑由此转化或延伸为人的心灵;口语的出现标志着三种各自独立的结构分岔:从感知到概念的分岔;从脑子

到心灵的分岔;从远古智人到现代智人的分岔<sup>④</sup>。

不足的是,口语作为语言演化链中的最初开始,高度依赖生命体。它随生命体生而生,也会随生命体亡而亡。洛根明确指出,口语是首要的语言形式,也是其他一切交流和信息加工的语言形式的基础;它是人类嘴巴说出的信息的总和,但它往往出口即逝。在洛根看来,语言只有以其语义要素与句法结构构成文化基因,才能被有机体进行自我催化繁衍。基于此,洛根划分出口语、文字、数学、科学、计算机技术和互联网等六种语言形态,并指出,后五种语言是特色鲜明的人类语言形态,有高于并超越口语特征的语义结构和句法结构,且每一次形态的演进都是为了应对信息超载而产生。后一语言形态既是对前一语言形态语义要素和句法要素的涵括,又会因为要解决信息超载问题而形成自己独特的语义要素和句法要素<sup>⑤</sup>。进而,“语言新形式产生的动力似乎严格局限于更大信息处理能力的需求,而不是由更大交流能力推动的”<sup>⑥</sup>。文字就是典型的例证。苏美尔人起初使用文字并不是用来交流的,而是用来记录向国家纳税的。管理灌溉系统的祭司向农夫征税时要储存和记录复杂的数据,但由于人记忆能力的限制,文字被发明出来就是作为永久性的记录之用。其后,才用于交流目的和信息管理的。

可见,语言形态的演进必然要仰仗媒介技术的发展。洛根以心灵作为人与动物的区分标准,直指了人的记忆的物化或外部化本质上就是要突破大脑的局限性,拓展语言的表意能力和存储能力。而这只有寻求外部媒介的承载才能完成。因此,从口语到文字、数学、科学、计算机技术和互联网的语言形态的演进,不仅是简单的基于媒介的语言形式的递进,更是交流、储存、检索、组织和加工信息策略方式的演进。或者说,记忆的技术化手段的演进导致了不同语言形态的构成,也内在地规定了记忆外部化必然走向“‘术’优先”的基本原则。

① 弗朗西丝·叶芝:《记忆之术》,钱彦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9页。

② 弗朗西丝·叶芝:《记忆之术》,钱彦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9页。

③ 弗朗西丝·叶芝:《记忆之术》,钱彦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75页。

④ 罗伯特·K·洛根:《什么是信息:生物域、符号域、技术域和经济域里的组织繁衍》,何道宽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9年版,第52—64页。

⑤ 罗伯特·K·洛根:《什么是信息:生物域、符号域、技术域和经济域里的组织繁衍》,何道宽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9年版,第69—72页。

⑥ 罗伯特·K·洛根:《心灵的延伸:语言、心灵和文化的滥觞》,何道宽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9年版,第24页。

## (二) 信息交流要求下的“力”选择:作为回忆的语言

言语有两大基本功能,一是用于交流,二是通过概念化进行抽象思维。在前文字社会,言语最先作为社会互动的媒介为人们之间的合作提供帮助,然后才衍生出更复杂的功能,被用于讲故事、唱歌,最后才作为记录工具来存储和再现文化信息,从而成为信息工具,并使之能被储存和检索。不难发现,与信息处理要求不一样的是,信息交流本质上是回忆的调动,即阿莱达·阿斯曼所说的“力”的调动:无论交流还是概念化的抽象思维必然只是对部分信息的选择性调用,而不可能是全部信息的完整呈现。阿莱达·阿斯曼以“回忆的隐喻”为核心概念对此进行了深入论述。

“回忆的隐喻”涉及文字隐喻、空间隐喻和时间隐喻三个方面。功德祠、纪念剧院和图书馆是回忆最典型的空间隐喻,记忆由此被普遍化隐喻为集体知识的储存器。精神的肠胃则是回忆最典型的时间隐喻,它以肠胃的吞咽、反刍和消化功能隐喻记忆的全过程。肠胃的吞咽功能隐喻着记忆的保存过程,这一过程只是存储功能,并不能赋予记忆以意义,恰如肠胃虽已完成吞咽却不能品尝其味道一样。与被吞咽的食物只有经过事后的反刍和消化,其味道才能被真正感受一样,记忆只有通过回忆才能真正建构记忆的意义所在。在这一过程,遗忘与重构冲向前台。冷冻和解冻、睡眠和觉醒、招魂成为表达回忆内在动力的最佳隐喻。而“越是强调时间维度是决定性的因素”,“再造”就越成为记忆的“根本问题”<sup>①</sup>。“档案”由此成为注释空间隐喻和时间隐喻的核心。它“作为一个城邦、国家、民族、社会的机构化的记忆,其状态就处于功能记忆和存储记忆之间,具体要看它是被当作一个统治工具,还是被当作一个外置的知识存放地来组织”<sup>②</sup>。它直指了记忆的两个方面:一方面体现为记忆的储存量,另一方面体现为回忆的选择性,从而与图书管理员和档案管理员的形象联系在一起。

文字隐喻则集空间隐喻和时间隐喻为一体。在阿莱达·阿斯曼看来,“在空间的记忆模型和以时间为主的记忆模型之间,是那些以文字的图像或者痕迹的图像为参照的模型”<sup>③</sup>。由此,她认为,媒介和“回忆的隐喻”存在着紧密的相互关系。“在电子文字发明之前,书写局限于两种基本的技术:把颜料涂抹到一个平整的平面上或者刻到一个可以接收的物质上。”<sup>④</sup>文字的隐喻和书写媒介变化及演变紧密相关,虽然先后经历了从黑板隐喻到书籍隐喻到复写羊皮纸隐喻到“光线文字”(摄影)隐喻的变化,其实都可以普遍化为书写的隐喻。在此,她提出了“痕迹”概念:“文字”作为符号编码的意义没有被凸显,而是将与“痕迹”等同。不过,文字与痕迹并不是同一意思。“文字是把语言编码成视觉符号的形式,这个定义并不能用在痕迹上。”<sup>⑤</sup>而将二者联系起来,直指记忆书写其实包括两个部分:一个是有意识的书写,以文本形式体现;一个是无意识的书写,以残留物、痕迹、垃圾的形式体现。前者是编码的信息,而后者是间接的信息,记录了一个时代没有被修饰的记忆,这种记忆不受审查制度和篡改的影响<sup>⑥</sup>。进而,阿莱达·阿斯曼又认为,“痕迹”与记忆概念更相吻合:痕迹成了文字和图像的概括性的上位概念;记忆和痕迹由此成为一个同义的概念<sup>⑦</sup>。

进言之,通过文本形式呈现的有意识的书写更多体现为功能性记忆,昭示着记忆的维度;而以物的形式呈现的无意识的书写更多体现为存储性记忆,昭示着遗忘的维度。由此,“痕迹”因书写的物质性而成为记忆与遗忘平衡性的最佳隐喻。赵勇先生对鲁迅手稿价值的分析就是对此现象的贴切注脚。他指出:“有的文章用的是蝇头小楷,工工整整;有的文章用的则是行楷行草,勾勾划划。而那些勾划、涂抹、删除、添加的地方尤其醒目,它们明白无误地向人们呈现出写作者思考的轨迹,他的犹疑、遗忘、突然的发现、甚至写作时的心情都被毛

①阿莱达·阿斯曼:《回忆空间:文化记忆的形式和变迁》,潘璐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97页。

②阿莱达·阿斯曼:《回忆空间:文化记忆的形式和变迁》,潘璐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399页。

③阿莱达·阿斯曼:《回忆空间:文化记忆的形式和变迁》,潘璐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97页。

④阿莱达·阿斯曼:《回忆空间:文化记忆的形式和变迁》,潘璐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66页。

⑤阿莱达·阿斯曼:《回忆空间:文化记忆的形式和变迁》,潘璐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35页。

⑥阿莱达·阿斯曼:《回忆空间:文化记忆的形式和变迁》,潘璐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34—243页。

⑦阿莱达·阿斯曼:《回忆空间:文化记忆的形式和变迁》,潘璐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36页。

笔镌刻在宣纸上,固定成了独一无二的存在。”<sup>①</sup>在他看来,与铅字印刷的正式文本相比而言,正是这满纸的痕迹更能泄露作者创作的心路历程,从而让手稿成为鲜活的写作教科书。

“回忆的隐喻”既是记忆的隐喻,也是记忆危机的隐喻。作为记忆危机的隐喻,“档案”与“痕迹”都和遗忘维度密切相关。有“档案”就有与之相对应的“垃圾物”,它提醒我们回忆有天然选择性;“痕迹”则意味着遗忘所呈现出的阴暗、遮掩和杂乱。阿莱达·阿斯曼明确指出:与语言符号相比而言,痕迹本身并不具备语言的关联,也没有编码的符号特征,但它在事后却能作为一种特殊的符号来阅读,且在痕迹那儿只有过去意义的极小部分能够被修复,从而将不可分割的回忆与遗忘编结在一起;而且,痕迹概念的提出使得书写范围超越了文本,几乎可以扩展到一切物体<sup>②</sup>。因此,“遗忘是存储的对手,但是是回忆的同谋,回忆和遗忘这种不可捉摸的相互作用的背后,有一种人类学的力量,这种力量是动物和机器都没有的”<sup>③</sup>。

## 二 互联网语言的独特记忆结构

如前所述,“语言的定义既根据其信息处理能力,又根据其交流能力”<sup>④</sup>。据此,洛根将口语、文字、数学、科学这样的自然语言形式的出现主要归因于记录和交流思想的压力,而计算机、互联网这样的人工语言形式的出现主要归因于信息处理的巨大压力。就互联网语言而言,它通过技术的极致发展同时实现了信息处理和信息交流能力的极大提升,从而塑造了不同于自然语言的独特记忆结构。

### (一)化静为动:互联网语言的连接之“术”

在洛根看来,互联网作为语言不仅包含计算语言的一切语义元素和句法元素,还包含了两个范畴的独特元素。万维网是其独特的语义元素,具体体现为电子邮件、邮件清单管理程序、聊天室、文件传输协议部署方案、远程网络设备、网页、网址、内联网、外联网、门户网站、电商网站等,其

独特的句法元素则包括超文本、互联网协议、搜索引擎等。超文本使赛博空间里的所有网站和网页链接起来,形成一个硕大无比的全球文件。互联网协议容许接入互联网的所有计算机连接起来,形成一个硕大无比的全球网络。搜索引擎使知识和信息的获取效率提高,并有利于人们互相寻找,促进了全球知识共同体的形成<sup>⑤</sup>。显然,前者体现的是互联网语言形式的信息处理能力,后者体现的是互联网语言形式的交流能力。

不过,洛根从媒介技术特征的角度解读互联网语言的列举论证方法有其局限性。他并未对互联网作为语言的本质特征进行更为直接的切入和分析。放眼当下,移动互联网技术、人工智能技术、虚拟现实技术、云计算技术、数据挖掘技术等叠加发展已使得媒介呈现“泛媒介”和“超媒介”的显著特征,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人与媒介的高度融合。传统媒介本体的限制被突破,人性化趋势(anthropotropic)<sup>⑥</sup>发展明显,人一媒共生体已成为显见的事实,人本身成为超级生物媒介;二是人与环境的高度融合。在移动互联网技术、定位技术的普遍应用及云计算技术的加持下,传统的媒介界面逐渐消失,环境开始成为重要的场景媒介,万物皆媒已然由虚拟描绘成为显见现实。进而言之,人、媒介、环境三大传播要素已融为一体,并为数据化的形态所表征。据此,维克托·麦迈尔-舍恩伯格在《大数据时代》中说,文字、方位、沟通都可以被量化为数据,世间万物都可以数据化;世界的本质是数据<sup>⑦</sup>。而他在《删除——大数据的取舍之道》中进一步指出,数字化、廉价的存储器、易于提取、全球性覆盖等四大驱动力使得世界已经被设置成记忆模式<sup>⑧</sup>。要言之,数据才是互联网语言的本质所在。将之置于记忆视域之中,数据记忆模式才是互联网语言形态最为独特的语义要素和句法要素。

从语言功能与记忆的关系来看,语言的两大基本功能可以划分为表达功能和交往功能。作为

①赵勇:《电子书写与文学的变迁》,《文艺争鸣》2008年第7期。

②阿莱达·阿斯曼:《回忆空间:文化记忆的形式和变迁》,潘璐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32—239页。

③阿莱达·阿斯曼:《回忆空间:文化记忆的形式和变迁》,潘璐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2页。

④罗伯特·K·洛根:《心灵的延伸:语言、心灵和文化的滥觞》,何道宽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9年版,第26页。

⑤罗伯特·K·洛根:《心灵的延伸:语言、心灵和文化的滥觞》,何道宽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9年版,第33—34页。

⑥陈功:《保罗·莱文森的人性化趋势媒介进化理论》,《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

⑦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肖尼思·库克耶:《大数据时代》,盛杨燕、周涛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97—126页。

⑧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删除——大数据的取舍之道》,袁杰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67—116页。

表达的语言与人的思维直接相关,最初体现在个体层面,涉及的是记忆的思维表达与个体再现;作为交往的语言更多体现在群体及集体层面,涉及的是语言规范的形成与记忆的群体及集体共有;而表达功能与交往功能的共振则形成了哈布瓦赫所说的记忆的社会框架。或者说,记忆总是在社会交往中通过语言被表达并形成一套意义象征体系。作为当前最重要的人工记忆模式,数据记忆模式无疑首次最大化地满足了人类一直对完整记忆的需求。不仅其海量的数字化记录已然最大化地囊括了世界万物,而且在交往形态上更是实现了对时空的最大跨越。

与传统记忆模式显著不同的是,互联网语言将记忆的有意识书写和无意识书写直接外化为数字痕迹。科学家理查德·塞蒙(Richard Semon)早在1904年就将用于储存和检索记忆的神经基质定义为“印痕(engram)”<sup>①</sup>,他明确将大脑对于外界刺激而形成的痕迹视为记忆本身。在他看来,记忆的痕迹在对外界刺激时会不断被激活,从而开启和强化记忆过程,并通过自我的确认与承认实现自我建构。安德鲁·琼斯在《记忆与物质文化》一书中对记忆与物质的关系进行了深入探讨,他特意引用了佩尔斯的观点:物质性不应被当作是一种物的性质,而应该是一种关系的性质<sup>②</sup>。在他看来,物不仅为记忆提供场所,还能激发回忆。这本质上和记忆的时间维度相关,因为只有物质才能对时间的存在做最好的支撑。人与物的相互依存、相互投射,使得记忆的过程必然要贯穿物的痕迹。而数字痕迹的出现,不仅能将所有的记忆及时记录,而且可以轻松地实现内容与内容、个体与个体之间的连接。或者可以借用阿莱达·阿斯曼将数字文字视为“流动性文字”的比喻,互联网语言其实就是一种“流动性记忆”:它不仅是信息存储的完美容器,更是信息交互的技术“座架”;它不仅是个体的全过程记忆,更是个体与个体、群体与群体间交流的记忆。

## (二)化无为有:互联网语言的算法之“力”

阿莱达·阿斯曼认为,在通往过去的入口,痕迹与文本往往对立。就传统书写记忆而言,文字书写工具的物质性必然产生痕迹,从而使得文本成为有意识的记忆,而痕迹成为无意识的记忆。换言

之,恰恰是记忆书写的物质性彰显了文字与记忆及人的身体的紧密关联度。文字作为记忆的支撑物形成的各种文本并不必然保证过去、现在和未来的联合。因为文本总是通过经典化和不断阐释而被优先送到人们面前,总是和权力相关联。相反,痕迹容易被人忽视,甚至沦为残留物和垃圾,总是反权力的,并最大程度上保持了原真性和可信度。

因此,若是将痕迹和文本都视为文字,则痕迹是作为事前文字而存在,文本是作为事后文字而存在。它事实上暗合了文字演变过程中技术变迁所带来的潜在影响。一方面,文字的演变与自然语言及其关联的记忆和人的身体不断脱钩。从象形文字到字母文字再到模拟文字再到数字文字的演变过程中,符号数量在不断减少,抽象程度也同时不断加深。电子化与数字化推动数字文字奉行极简主义,不仅将文字极度简化为0和1,而且将记忆呈现为数据化的文本。在此,因传统书写物质性而产生的物理痕迹不再显现,取而代之的是囊括人类所有生活轨迹和行为轨迹的数字痕迹。但另一方面,传统书写与电子书写依然有着共通的法则。二者“都不是将书写缩减为一种事后文字,而是让其具有一个事前文字的特质”。在电子书写中,编程成为事前文字,承担作为“一种信号、一种激发,或者一个指令”<sup>③</sup>的作用;数据库成为事后文字,取代了传统的文本形态。然而,不论编程还是数据库,都以数字痕迹的形态来表现。在此意义上,记忆与痕迹真正合而为一,数字文字回归到柏拉图的记忆隐喻——记忆就是留在蜡板的痕迹——之中。

与传统书写相比,数字痕迹以数据的形态弥漫开来,几乎无所不在、无时不有、无人能避,却又不为人肉眼所能直接观察得知,从而表现出不同于物理痕迹的三个鲜明的特征:一是数字痕迹与文本统一为数据。数据记忆消解了痕迹与文本之间的界限。与传统物的痕迹的呈现形态不一样,它不再以物理痕迹的形态出现,而是统一到计算机语言的编程之中。只有熟悉计算机编程及大数据技术的人才能自如地窥视、监控、计算和利用它,并将之转换为人能理解的相应的信息符码。可以说,痕迹就是数据,数据就是痕迹。只是痕迹

<sup>①</sup>Sheena A. Josselyn, Stefan Köhler, Paul W. Frankland. “Heroes of the Engram”, *Journal of Neuroscience*, 2017, 37(18):46-47.

<sup>②</sup>Andrew Jones. *Memory and Material Cultur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p.36.

<sup>③</sup>阿莱达·阿斯曼:《回忆空间:文化记忆的形式和变迁》,潘璐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37页。

的解读必须通过机器的转换才能完成；二是数字痕迹的包容性和海量性。从文字演变的角度来看，数字文字由电子脉冲构成，不具有符号的特点，也不能再现任何东西。它不再服从于人类的直接交际功能，而成为一种“结构性的文字”：能够以同样的编码写下图像、声音、语言和文字<sup>①</sup>。从数字技术特征的角度来看，传感器的普及、人工智能技术的日益成熟已使得人们的生活轨迹、交往互动等都能被数据量化和精准化，并通过云计算技术进行深度画像。跨媒介性叠加高计算性使得数字文字可以轻松、立体、三维地表征世界万物，从而呈现无限大的包容性和海量性。简单地说，世界被数据化了。它直接推动人类进入一个被数据包围的世界，即所谓的数据社会；三是数字痕迹的可修改性。与物理痕迹的修改容易被察觉不一样的是，数字痕迹的修改甚至篡改极为容易，且常常真假难辩。如照片通常被认为能真实地呈现世界，而美图技术的盛行，已使照片俨然成为“照骗”。真与假之间的界限似乎不再被人们所关注，人们更想按着自己的情绪而不是理性来呈现自我。再加上人为操纵数据的因素，数字痕迹的修改甚至篡改在数字时代并不是件难事。

然而，数字痕迹于记忆之“力”而言反而呈现新的力量：“全面回忆”与“全球脑”成为可能。前一概念由戈登·贝尔提出并实践，它源自一个愿景，即如果我们能够克服“韶华易逝，人生易老”的自然规律，如果我们从来都不用忘怀任何事情，而且能够完全掌控自己的记忆<sup>②</sup>，意指只要形成了完整而及时的数字化记录，就能对人的一生进行全面而完美的回忆。后一概念由彼得·罗素（Peter Russell）在其1983年出版的《全球脑》一书中正式提出。在他看来，人类的所有大脑连接起来就构成一个具有全球智慧的地球脑。这已为当下大数据技术的广泛应用所部分证实。人们借助数据挖掘，通过相关性的关联与比对，获得了“上帝之眼”。而这一切的完成显然得力于互联网及其相关技术“化无为有”的能力，即数字痕迹摆脱了有形的物质性，以无形的形态表征了整个现实世界。

### 三 “术”“力”引发的两种“数字化遗忘”

综上，作为一种数字文字，互联网语言因技术的力量而彰显其记忆结构的独特性。然而，两种极端情形的“数字化遗忘”仍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 （一）技术性失忆式的“不去记”

在记忆媒介不发达时，记忆的最大危机就是“记不住”。而“数字化遗忘”的第一种表现就是由“记不住”转化为“不去记”。阿莱达·阿斯曼对此有着较为深入的讨论。秉承柏拉图对文字的警惕态度，阿莱达·阿斯曼认为，记忆之术的独立和扩张是以牺牲记忆之力即不可掌控的心理能量为代价的。换言之，记忆媒介越发达，存储能力和传播能力越强大，人们反而越容易失去自然的记忆力。在阿莱达·阿斯曼看来，文字的演变经历了象形文字、字母文字、模拟文字与数字文字四个阶段，且前一阶段向后一阶段的演化都是符号抽象程度的不断提高和存储能力的不断跃升，即一方面符号的数量虽在减少，另一方面却能再现每一种自然语言。数字文字将这一过程推向了极致，它奉行极简主义编码，将之简化为0和1两个不同元素的构成。阿莱达·阿斯曼将之称为“结构性文字”：它由脉冲组成，但并不具备符号特点，自己也不能再现任何东西。由此，它超越了文字与语言的先期联系，而更多呈现为跨媒介的能力，能够同时囊括图像、声音、语言和文字<sup>③</sup>。与语言最初关联的是人的思维，数字文字明显弱化了语言与思维的关系，却在存储能力上展示出巨大的容量，并释放出巨大的流动性。作为一种流动性的文字，数字文字编织出越来越密集的交往网络，时间和空间所带来的交往障碍被克服。理论上说，人们凭借数字文字可以实现跨时空的交流，人们之间可以随时随地发生交往，从而将人们置于共同的地球村之下。

循此思路，阿莱达·阿斯曼进一步分析指出，数字文字的出现更是加剧了这种错位。数字文字以非物质化的方式成为流动性文字的同时，颠覆了“文字作为一种暗示性的记忆隐喻的那些最重要的特征：起固定作用的刻入被图像瀑布和信息洪流所取代，正如S·J·施密特表达的那样，这

<sup>①</sup>阿莱达·阿斯曼：《回忆空间：文化记忆的形式和变迁》，潘璐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37页。

<sup>②</sup>戈登·贝尔，吉姆·戈梅尔：《全面回忆——改变未来的个人大数据》，漆彝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4页。

<sup>③</sup>阿莱达·阿斯曼：《回忆空间：文化记忆的形式和变迁》，潘璐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37页。

些东西植根于遗忘程度很高的序列性”<sup>①</sup>。在她看来,数字文字不再与传统的书写动作发生任何联系,也就不再对回忆和遗忘进行明确区分了。因此她说,“数码媒介时代的记忆的状况显出如下的特点,即回忆与遗忘越来越失去了它们明显的区别。在这一点上,记忆的结构与下意识的结构相接近”<sup>②</sup>。进而,她甚至将大众传媒与极权国家相提并论,认为“它们都威胁记忆,不管是通过残暴的限制,还是通过信息的赘余”<sup>③</sup>,即二者都志在营造一个控制记忆的世界。越依赖外在记忆,我们自身的记忆力就会越脆弱,我们的情感和经历就越易被利用、扭曲和控制<sup>④</sup>。斯蒂格勒则说得更直接,他断言:“文字记载的记忆威胁着知识回忆的记忆,记载记忆有玷污回忆记忆的危险,以致将它毁灭……计算带来的技术化使西方的知识走上一条遗忘自身的起源,也即遗忘自身的真理性的道路。”<sup>⑤</sup>

## (二) 计算主义之下的“忘不了”

“数字化遗忘”的第二种表现则是由“记不住”转化为“忘不了”。随着大数据技术、云计算技术及人工智能技术的协同发展,以数字痕迹形态呈现的记忆不仅能被完整地保留,还能被精准地计算,从而获取人类肉眼难以企及的全视角。因此,数据记忆形成前所未有的两大显著特征:一是具有超强的全时化记忆的特征。由于数字技术与全球网络的普及,数字文字将世界变成了数据世界。“电视的图像洪流使得文字作为核心的记忆媒介变得可有可无;新的存储和信息技术是以另外一种文字为基础的,即数字文字,它的流动的形象与老旧的写入动作不再有任何关系。这种文字不再对回忆和遗忘进行明确的区分。”<sup>⑥</sup>当前移动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使得人们可以24小时永久在线;传感器的普及,使得机器可以不知疲倦地随时记录和及时响应。一种全时化记忆的人工记忆模式已然形成。人们在网络社会的记忆书写、行为模式等以数字文字的形式得以保存并被检索。与人类记忆模式相比,记忆的选择性变得似乎不

再重要。数据库已然成为人们外化的记忆仓库,基于需求,人们可以随时随地通过搜索工具就能从中提取。它不仅被及时全面地记录,而且形成数据库,不会遗忘。只要一个指令,便会全面唤醒与精准调出;二是具有超强的自组织能力。文字与记忆的关联度历来受到文艺复兴时期理论家们的高度推崇,因为文字本身既是人记忆能力的体现,又是帮助人扩展思维和行动空间的重要工具。数字文字以0和1两种元素成为以计算机为中介的世界语言。人们借助计算机可以将自己的语言转化为数字文字,又可以将数字文字转化为自己的语言。然而,在此过程中,人本身反而被推向边缘,甚至将自我删除。据此,阿莱达·阿斯曼不无悲伤地指出,电子文字已不再服从于人类的交际功能<sup>⑦</sup>。不过,她的分析有一个疏漏。数字文字本身虽与人类自然语言背道而驰,但因其标准化而成为最好的存储和传播中介,再加上互联网“链接一切”的功能,从理论上讲它反而使得全世界范围内的交往成为可能。也就是说,它不仅没有消弥交往,反而还扩大了交往的时空范围。只不过,与传统交往相比,这种交往更多体现为人们通过互联网手段而实现的信息之间的交互,人们现实交往之间的直接感知和经验往往消散不见。

于是,计算主义作为一种哲学理念和认识论开始渗透到人文学科的研究视野之中。相应地,以人本主义哲学为基础的传统记忆理论及实践也为计算主义所僭越。与传统记忆理论强调记忆与人及身体的关联度不一样,计算主义认为,认知就是计算,即人的认知和智能都可以通过计算机进行编码来呈现,那就意味着人的认知和智能都可以转化为图灵机状态,通过算法来模拟和再现。在其视野下,“无论是人的大脑、人的行为还是人与整个物理世界、虚拟世界的交往过程,都变成了一个庞大复杂的计算系统”<sup>⑧</sup>。由此,世界的被数据化使得遗忘变得很难,“万事万物都成为记忆的对象,然而人们也因此因此在记忆宫殿里迷失了记

①阿莱达·阿斯曼:《回忆空间:文化记忆的形式和变迁》,潘璐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38页。

②阿莱达·阿斯曼:《回忆空间:文化记忆的形式和变迁》,潘璐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43页。

③阿莱达·阿斯曼:《回忆空间:文化记忆的形式和变迁》,潘璐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40—241页。

④赵静蓉:《记忆危机的伦理学阐释和社会学分析》,《文化研究》2013年第3期。

⑤贝尔纳·斯蒂格勒:《技术与时间1:爱比米修斯的过失》,裴程译,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4页。

⑥阿莱达·阿斯曼:《回忆空间:文化记忆的形式和变迁》,潘璐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40页。

⑦阿莱达·阿斯曼:《回忆空间:文化记忆的形式和变迁》,潘璐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38页。

⑧刘庆振,钟书平,牛新权:《计算传播学:缘起、概念及其计算主义视角》,《西部学刊》2019年第8期。



忆的焦点,记忆进阶为一种新的‘遗忘’。”<sup>①</sup>在此,尼采所言的遗忘的积极性力量似乎正在被放弃。而更可怕的是,记忆的数据化反转了文字作为记忆的服务性、工具性的角色,反而将人类的思想工具化。不论个人行为还是社会行为都为数据所量化,意味着本应由人主导的记忆让位于资本和技术,数据和算法开始成为记忆的灵魂。人本身反而被边缘化了。而且,人们忽略了一个问题,即数据的量化并不绝对科学,它也并不天然地与理性、客观能划上等号。恰如彭增军所言:“量化后的数据是对现实的再造,而不仅仅是对现实的描述,而这个再造的现实往往取代了真实的现实。”<sup>②</sup>也就是说,计算主义的盛行其实同样导致回忆在进一步丧失。

### 结语

作为语言的互联网与记忆之间的关系表现出明显的“药理学”特征。一方面,它张扬了记忆之“术”,促成了记忆的无比丰富性;另一方面,它又展现出新的记忆之“力”,为技术更深入地了解人们甚至触及人类的心灵提供了可能,这是药的解

放作用。然而,记忆危机并没有因此而减少,反而获得了更为隐秘的方式,表现为“不去记”“忘不了”两种极端情形的“数字化遗忘”,这是药的毒性。进言之,媒介俨然成为数字时代记忆的隐形管理者。而互联网语言“术”“力”的极致发展提醒我们,记忆的最大危机其实是记忆与遗忘平衡性的丧失。“数字化遗忘”将二者间的关系推向极端:一是全部忘记,一是全部记得,分别对应着“不去记”“忘不了”两种。在当下,前者表现为历史虚无主义的盛行,极易造成身份认同的缺失。更可怕的是,别有用心者还会利用互联网信息不断覆盖的特点来操纵和篡改记忆;后者表现为人的被全面监视和隐私的被无度侵犯,不仅容易造成记忆的负重与过载,而且还为超级全景监狱的形成提供了可能。因此,应对互联网时代记忆危机问题最重要的策略仍然是保持记忆与遗忘的张力关系。进一步说,互联网作为记忆的媒介本身并无善恶之分,但互联网应用背后的权力运用得当与否倒是会产生善恶的不同结果。而要想保持记忆与遗忘的张力关系,重要的是对互联网背后资本及权力的渗透和滥用保持警惕。

## “Digitalized Forgetting”: The Internet Language Crisis of Data Memory

ZHANG Shun-jun

(School of Humanities, Hu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Xiangtan 411201, China)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emory, language confronts pressures in both information processing and information exchange. Under the requirements of information processing, the language of storage pursues the principle of “technology” priority, while under the requirements of information exchange, the language of memory is presented as “power” selectivity. From a linguistic point of view, Internet language is a digital script. Due to the extreme development of technology, it presents a unique memory structure: the “technology” of connection that turns static into motion and the “power” of computation that turns nothing into something. However, Internet language has not reduced the occurrence of memory crises, but has presented itself in two extreme forms of “digitalized forgetting”, namely “not remembering” and “not forgetting”. This serves as a reminder that the most critical method for resolving the memory crisis in the Internet age is to maintain the tension between remembering and forgetting.

**Key words:** data memory; digitalized forgetting; memory crisis; Internet language

(责任校对 朱正余)

<sup>①</sup>王蜜:《记忆的现代性危机与记忆的开启》,《天津社会科学》2019年第3期。

<sup>②</sup>彭增军:《从人文到技术:新闻的量化转身》,《新闻记者》2020年第5期。